

近二十年明清書籍、印刷與出版文化 相關研究成果評述

王一樵^{*}

近年來學界有關明清時期出版業史、印刷業史、書籍史，以及各類書目學、文獻學、版本學的研究成果已然汗牛充棟。但檢視相關研究回顧，筆者認為對於分析書籍文化與出版文化如何透過商業出版的經濟行為，以及如何經由商販物流活動，進而與社會產生各層次互動的回顧與討論方面；又或者是對於近現代出版與印刷事業，其在消費與文化生產層面上的研究回溯方面，相關研究評述對上述議題著墨甚少，有待進一步補充。此外，歐美學界關於圖書出版文化與商業出版活動研究的研究取徑，也漸漸開始影響到歐美學界的中國史研究領域，形成一系列研究成果。本文將由近二十年來學界對於明清時期出版業、印刷業相關研究成果，展開回顧評述，並在第二部分討論商業出版的新近研究成果。最後，文末將綜合討論近年來相關研究成果，並提出一些研究上的未來展望，以及相關研究取徑的可能性。

關鍵詞：出版文化 商業出版 書籍文化 書籍史 反印刷文化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

前言

出版業、印刷業以及書籍業是一系列由書籍、書商、作者與讀者所構成的人際網絡，並以書籍為媒介，構成商品物流，從而形成了商業出版文化的內涵脈絡。人群與商業的互動是出版過程中不可欠缺的要素，而出版事業本身也構成人類思想交流與互動的知識平臺。寫作者與閱讀者透過各種出版的形式，無論他們是基於純粹的商業利益，還是帶有官方色彩的政治目的，我們都無法否認書籍出版所形成的龐大知識交流。無論中外，人類的閱讀、書籍出版，以及寫作文化，都有其歷史發展的諸多過程，而且影響甚為深遠，實有待研究者深入加以追尋與探索。¹近二十年來西方學者關於印刷史、書籍史、以及出版文化史方面的研究，其本質上和文獻學、版本學與目錄學處理的問題有所不同。西方學者提出新的研究取向，試圖結合出版文化史與寫作文化史，並穿越物質層面的書籍與文獻，由社會生活中析理出各種社會群體透過出版與寫作所形成的各種複雜脈絡與關係。²簡而言之，就是透過書籍之文化作用與其各種思想上、文化上、社會上與經濟上的影響，觀察其時其地的歷史演進。³

¹ 誠如西方學者 Robert Darnton 所言：「……閱讀有其歷史，但我們如何能發現它？我們能夠由讀者們的記錄作為研究的開始。」；「……閱讀與生活，理解文獻與建立人生的意義，對於前近代的人而言遠較現代人更加的密切貼近。」由上述論點可知，研究出版文化的意義正在於透過跨領域的方式，經由社會文化、閱讀行為、與書籍出版等多種研究取徑入手，進而理解當時人類思想與知識活動，展開更深入的討論與研究。參見 Robert Darnton, "History of Reading," in Peter Burke ed.,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2), 141-142.

² 秦曼儀認為「寫作文化史」(history of written culture)指稱的是一個文化史研究中的重要領域，尤其是 Roger Chartier 在方法論的貢獻與研究成果已成為近十幾、二十年歐美史學中整合文本批判(textual criticism)、書籍史(history of books)以及閱讀史(history of reading)的重要代表。是故寫作文化史，是一個綜合的研究領域，試圖更詳細理解書籍及其背後種種之思想文化意義。參見秦曼儀，〈推薦序：《印刷書的誕生》，複數閱讀實踐史的開始〉，附於費夫賀、馬爾坦著，李鴻志譯，《印刷書的誕生》(臺北：貓頭鷹出版，2005)，頁 5-9。

³ 秦曼儀，〈推薦序：《印刷書的誕生》，複數閱讀實踐史的開始〉，頁 7-8。

回顧學界有關明清時期的書籍史、出版業史、印刷業史，以及各類書目學、文獻學、版本學的相關研究成果已然汗牛充棟。學界也有許多相關學術專著、會議論文集，以及研究回顧發表，研究成果豐富。⁴但若詳細檢視相關研究回顧，筆者認為對於分析書籍文化（culture of book）與出版文化如何透過商業出版的經濟行為，以及如何經由商販物流活動，進而與社會產生各層次互動的回顧與討論方面；又或者是對於近現代出版與印刷事業，其在消費與文化生產層面上的研究回溯方面，各種研究評述對上述議題卻著墨甚少，有待進一步的討論與補充。⁵此外，近來歐美學界關於圖書出版文化與商業出版活動研究的研究取徑，也漸漸開始影響到中國史相關研究領域，形成一系列討論與研究。以下將由近二十年來學界對於明清時期出版業、印刷業相關研究成果，展開回顧評述，並在第二部分討論商業出版的新近研究成果。最後，本文將綜合討論近年來相關研究成果，並提出一些未來展望，以及相關可能性。

一、研究成果回顧

（一）「書籍史」、「出版史」、「印刷史」的源起與歐美學界相關研究

近二十年來西方學者不斷質問傳統中國出版文化的諸多議題，特別是處

⁴ 關於明清時期書籍文化史的回顧，參見涂豐恩，〈明清書籍文化史的研究回顧〉，《新史學》，20：1（2009），頁181-215。

⁵ 相關研究成果評述眾多，關於歐美學界討論參考：Cynthia J. Brokaw, "O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China," in Cynthia J. Brokaw and Chow Kai-wing eds.,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5-6. 中文學界研究回顧可參考：韓琦、米蓋拉編著，《中國和歐洲：印刷術與書籍史》（法文書名：*Chine et Europe: histoires de livres*）（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頁255-303。錢存訓，《中國書籍、紙墨及印刷史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92）。日本學界對此議題的討論，參見高津孝，〈米国の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中国——社会と文化》，20（2005），頁471-481。臺灣學界的相關研究討論，參見涂豐恩，〈明清書籍文化史的研究回顧〉，頁181-215。王一樵，〈評述 Cynthia J. Brokaw, *Commerce in Culture: The Sibao Book Trade 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臺大歷史學報》，44（2009），頁265-275。此外，關於近年來大陸學者相關領域的研究概況，參見張仲民，〈從書籍史到閱讀史——關於晚清書籍史、閱讀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史林》，5（2007），頁151-180。

於近代早期與近代化過程中的印刷出版，如何在傳統中國的歷史發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是歐美學界相當關注的課題。⁶其次，結合社會史與出版文化的書籍史、出版史、印刷史研究，已形成一股趨勢，並引申出許多相關議題，例如出版技術與出版的組織結構如何形塑傳統中國的書籍文化，書籍出版對社會的各種衝擊與影響，以及對於社會互動、思想與文藝交流，對於文化、宗教信仰、政治與科學知識的傳播、傳遞有何影響等。

此研究趨勢的源起可追溯至法國年鑑學派關於閱讀史、書籍史的早期研究所形成的影響。⁷1950年代，費夫賀(Lucien Febvre, 1878-1956)與馬爾坦(Henri-Jean Martin, 1924-2007)於《印刷書的誕生》中首先提出書籍史的研究取向。倆人在書中開宗明義宣示印刷書所代表的，即是訊息傳遞的社會文化史。自此之後，相關議題便如雨後春筍般陸續出現，蔚為一時潮流。稍後，許多前瞻性研究，例如Elizabeth Eisenstein、Roger Chartier、Robert Darnton、D. F. McKenzie等人，則強調關於出版文化的更廣泛歷史定義。綜合而論，近年研究成果雖然主要仍由西方文明發展問題作為出發點，並將其疑問與思索投射到中國史研究。但這些研究卻也提供一些較新的研究視角，學界漸將出版文化史與社會史、思想史，以及城市史與區域研究結合，呈現有別於以往的研究成果。

此一跨領域、跨科際的突破性發展，最早可回溯至《清史問題》(*Late Imperial China*)於1996年推出的「晚期中華帝國的出版與印刷文化」(*Publishing and the Print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專號，共收錄有弗里德曼(Jill A. Friedman)、賈晉珠(Lucille Chia)、包筠雅(Cynthia Joanne Brokaw)、卜正民(Timothy Brook)、周啟榮(Kai-wing Chow)、貝爾(Catherine M. Bell)等人，共六篇文章，可見其端緒。⁸歐美學界發表的相關研究成果方面，則以1998年美國奧勒岡州(Timberline Lodge)舉辦的「中華晚期帝國出版與書籍文化研討會」發表成果所集結的會

⁶ 近年來討論此議題的西方學者眾多，例如：Cynthia Joanne Brokaw、Chow Kai-wing (周啟榮)、Joseph McDermott、Lucille Chia、Anne E. McLaren、Robert E. Hegel、Katherine Carliz、Evelyn S. Rawski、Anne Burkus-Chasson、Julia K. Murray 等。

⁷ Cynthia J. Brokaw, "O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China," 6-7.

⁸ Jill A. Friedman, Lucille Chia, Cynthia Joanne Brokaw, Timothy Brook, Kai-wing Chow, and Catherine M. Bell, "Publishing and the Print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17:1 (January 1996): 1-200.

議論文集，可說是相當重要的代表成果。⁹該會議與會學者由三個主要領域，針對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書籍史、閱讀史，以及商業出版進行討論。此三領域分別是：一、商業出版與書籍市場的擴大；二、因應特定讀者群的出版業；三、圖書作為一種視覺媒介（visual medium），該會議論文集共收有十一篇論文。該書的宗旨，希望經由此討論，擴大有關中國書籍的文化史與社會史研究，以及建議有關中國書籍史的多樣化研究取徑。¹⁰

其後，美國學者賈晉珠 2002 年發表了討論十一世紀至十七世紀福建地區刻書業的專著，詳細分析當地的商業出版活動。¹¹2004 年，周啟榮發表《中國前近代的出版業、文化、權力》（*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書中討論前近代中國印刷業、出版業如何在明中葉以來商業文化轉變中，開始扮演文藝文化生產角色的學術專著。¹²周氏的研究補充科學技術發展研究中，常被忽視的社會文化層面議題。不同於以往的研究，周氏綜合書籍史量化分析的討論，亦延伸科學技術史的發展分析，並將十六、十七世紀知識分子的心態史，綜合成明清文化商業生產網絡的分析。該書關懷所及，使研究者們開始注意到一些生活於其中的知識生產者，他們既是「商人」，也是所謂的「山人」。¹³本書探討明中葉以來「文化商業化」(commercialization

⁹ Cynthia J. Brokaw and Kai-wing Chow eds.,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¹⁰ Cynthia J. Brokaw and Kai-wing Chow eds.,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cknowledgments, xiii.

¹¹ Lucille Chia, *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 (11th-17th Centuri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¹² 本書的五個章節標題，分別為：1. Cost of Production and Book Prices 2. The Chinese Book and Late-Ming Publishing 3. Commodification of Writing, Examination, and Publishing 4. Paratext: Commentaries, Ideology, and Politics 5. Public Authority, Literary Critics, and Organizational Power。參見 Kai-wing Chow,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¹³ 參見宋原放、李白堅，《中國出版史》（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1）。張煜明，《中國出版史》（武漢：武漢出版社，1994）。方厚樞，《中國出版史話》（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鄭士德，《中國圖書發行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肖東發，《中國圖書出版印刷史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姚伯嶽，《中國圖書版本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上述研究專著強調技術史與出版事業的演進，研究取徑上兩者採取的是不同的討論面向。周氏的研究補充科學技術發展研究中，時常被忽視的社會文化層面的議題。中文學界也有許多綜合介紹性的專書，或依照朝代順序，或是由印刷技術發展為主要編輯原則，概要性進行相關史實介紹，

of cultural) 的過程，以及商業化出版業日漸成長所帶來的諸多效應。本書由出版業的物質層面展開討論，並論及明中葉以來日益擴張的文藝菁英社群與國家政治力之間的互動。本書不僅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並且同時綜合前人研究成果。¹⁴周氏利用文化研究概念，例如場域、準文本等，定位整個前近代文化生產體系。他認為討論近代早期中國文化、經濟與政治領域的情形時，科舉考試是不能忽略的重要環節。周氏認為由於明代科舉額度有限，加上官員生涯開銷龐大，菁英能夠經由科舉投入官員生涯的比例漸漸減少。許多參與科考者在相當程度上都向商人大量借貸，這亦造成參與科舉在經濟上的困難程度。本書處理的商業寫作與出版者，即是在科舉考試失利，又或者是在等待下一次科舉的期間從事商業活動的文人們，其生活有賴於「賣文為生」的職業。明代商業出版（commercial publishing）的繁榮，提供士人們在經濟活動中的位置，因此經濟活動得以對文化生產加以重新構造。士人處於文化生產與經濟活動之中，在其參與文化生活的同時，也參與經濟活動。¹⁵

美國學者芮哲非（Christopher A. Reed）的《谷騰堡在上海：中國的印刷資本主義，1876-1937 年》（*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 1876-1937*）也在同年正式出版。¹⁶該書綜合討論印刷文化、印刷商業和印刷資本主義對中國近代民族主義所起的建構作用，並涉及相關議題。書中由印刷技術在近代中國的傳播，討論到上海石印技術的黃金時代。更由上海書店業，乃至於

參見嚴文鬱，《中國書籍簡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吉少甫，《中國出版簡史》（上海：學林出版社，1991）。魏隱儒，《中國古籍印刷史》（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1984）。史梅岑，《中國印刷發展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張秀民，《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張秀民、龍順宜，《活字印刷史話》（北京：中華書局，1979）。范慕韓主編，《中國印刷近代史》（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1995）。羅樹寶，《中國古代印刷史》（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1993）。

¹⁴ 作者在書中回顧歷來有關中國印刷出版文化研究，指出前人研究多有研究上的障礙之處。這些障礙集中在三個方面：第一，早期漢學家的研究取徑，基本上造成一定誤解。第二，過度依賴西方方法論與詞語，使研究出現障礙與誤解。第三，歐洲中心論、歷史主義、現代性敘述造成的研究困境。參見 Kai-wing Chow, "Introduction: Printing, Eurocentrism, and the Study of the Social in Early Modern China,"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1-18.

¹⁵ Kai-wing Chow,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90.

¹⁶ Christopher A. Reed, *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 1876-1937* (Vancouver, B. C.: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4).

文化街的形成，更描述印刷工人生活，以及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的成立過程等。各章節中還分別討論教科書、圖書市場、印刷觀念、印刷技術到印刷的組織模式等等經濟層面現象，更論及印刷業對中國近代文化、教育，以及政治的各種廣泛影響。其後，2006 年美國學者周紹明（Joseph P. McDermott）發表《中國書籍的社會史：晚期中華帝國的書籍與士人文化》（*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¹⁷作者取法社會學的研究取徑，關注十一到十九世紀中國書籍在文化中具有吸引力，以及其與權力、社會、經濟階層之間的各種關係，並討論書籍在技術、學術和社會關係方面的重要變化。書中不僅有針對印刷技術的產生、演變、書籍與士人文化傳播議題的宏觀論述，也有對藏書家們所進行的個案研究。

2007 年，美國俄亥俄州州立大學的包筠雅發表《文化貿易：清代至民國時期四堡的書籍交易》（*Commerce in Culture: The Sibao Book Trade 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則對清代至民國福建四堡地區販書業作出極為詳盡的研究。該書分成兩大部分：第一部分討論閩西四堡地區的書籍出版，以及販書業情況。書中分別討論四堡地區最重要的兩個出版業中心，「馬屋」與「霧閣」的出版業，以及當地馬家與鄒家所經營的重要書屋，並由此討論兩家宗族如何數代經營出版印刷業，以及相關產業的營收情形，甚至包括同業競爭。該部分的討論更廣泛擴及當地出版市場規模、販售物流、經營模式，以及分店經營管理等議題。作者更針對閩西等地書商如何呈現自我形象進行相關討論，呈現出馬家、鄒家等書商，融合商賈與儒者，又兼具地方士紳的特殊形象。¹⁸

該書第二部分討論四堡書商的出版品，由此展開後續討論。作者廣泛討論四堡出版品的多樣性，由科舉用書、啟蒙讀本、詩集、儒家經典等。此外，

¹⁷ Joseph P. McDermott,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¹⁸ Cynthia J. Brokaw, *Commerce in Culture: The Sibao Book Trade 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該書中文書評參見劉永華，〈包筠雅《文化貿易：清代至民國時期四堡的書籍交易》評介〉，《歷史研究》，4（2008），頁 181-187。王一樵，〈評述 Cynthia J. Brokaw, *Commerce in Culture: The Sibao Book Trade 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頁 265-275。

像是日用類書、萬寶全書、醫書、善書、命理風水用書等，也在四堡出版品項中。當然，也有娛樂性出版品，例如小說、戲曲、歌譜、畫譜等。作者更討論到四堡地區出版品與讀者的互動關係，例如品質評價、庶民文化形塑、讀者社群等。作者在此部分的後半將四堡地區的出版業，置於脈絡中進行分析，並與其他地區的出版業進行比較。最後，再針對清代出版文化與政治權力、社會狀況、識字能力等，進行比較分析。¹⁹包筠雅在研究過程中不單只是利用文獻進行，也充分配合田野調查，並與廈門大學、加拿大麥基爾大學等機構，進行跨國合作，對閩西四堡地區進行深入的田野訪查。²⁰2012年，中央研究院舉辦的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中，也有相關議題。包筠雅與周紹明分別就近世中國的書籍出版與流通網絡變化，以及清代蘇州善本書收藏與利用，發表學術論文。²¹

其後，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何予明（Yuming He）在2013年發表專著《家與世界：十六至十七世紀的明代印刷業》（*Home and the World: Editing the “Glorious Ming” in Woodblock-Printed Books of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該書聚焦於明代晚期木刻版印刷書籍與相關出版文化議題，主要探討明代大眾閱覽書籍的多種層面，例如物質文明、商品經濟，以及視覺體驗等，並且在此基礎上開展許多全新的研究領域。該書在2015年榮獲列文森中國研究書籍獎（Joseph Levenson Book Prize）。²²另外，近來也有針對地方志的出版刊印進

¹⁹ Cynthia J. Brokaw, *Commerce in Culture*.

²⁰ 劉永華，〈墟市、宗族與地方政治——以明代至民國時期閩西四堡為中心〉，《中國社會科學》，6（2004），頁185-198。

²¹ Cynthia J. Brokaw, “‘Spreading Civilization’: The Distribution of Commercial Imprint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 Miaw-fen Lu ed., *Paper from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Confucianism and Book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Familial, Religious, and Material Networks* (中央研究院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近世中國的儒學與書籍) (Taipei: Academia Sinica, 2013), 165-198. Joseph P. McDermott, “Rare Book Collections in Qing Dynasty Suzhou: Owners, Dealers, and Uses,” in Miaw-fen Lu ed., *Paper from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Confucianism and Book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Familial, Religious, and Material Networks*, 199-249.

²² Yuming He, *Home and the World: Editing the “Glorious Ming” in Woodblock-Printed Books of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Cambridge, Mass.: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3). 該書中文書評，參見段曉琳，〈評 Yuming He, *Home and the World: Editing the “Glorious Ming” in Woodblock-Printed Books of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明代研究》，25（2015），頁139-150。

行的專題研究，例如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歷史系戴思哲（Joseph R. Dennis）在 2015 年發表《中國近世地方志的書寫、出版與閱讀 1100-1700》（*Writing, Publishing, and Reading Local Gazetteers in Imperial China, 1100-1700*）一書，針對十二至十七世紀中國地方志進行相關的研究與討論，分析出版地方志的動機、編纂與搜集資料文獻的過程，地方志的預期閱讀者，以及出版商們如何進行跨區域活動，以及相關經濟情況等議題。²³

綜合而言，上述提及的跨國研究計畫在近來頗有相當程度的發展。除田野調查合作外，網路上也開始有相關研究社群的成立。2005 年，在哈佛燕京學社由魏希德（Hilde De Weerd）與戴思哲等人組成的「中國早期出版文化研究工作坊」（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Print Culture in China），開始利用群體研究，針對此議題進行長期研究。並設立網站提供一個跨國學術平臺，以便學者進行交流。²⁴同類型網站平臺另有由臺灣學者出面進行組織，結合大陸青年學者、歐美與日本博碩士生等成員組織的「近現代報刊與文化研究論壇」。該論壇提供相關研究領域的學者與青年學子一個跨領域、跨國界的平臺，進行學術交流。²⁵該論壇舉辦過多場學術演講，並舉辦海外考察活動。現有論壇成員，計有多名海內外學者，以及歐美、日本、大陸地區博碩士生多人。該論壇除計畫網站外，另於新浪網上開設有部落格（Blog）論壇形式的「近現代報刊與文學研究論壇」討論區。²⁶

（二）中文學界有關出版業、印刷業、書籍業的研究近況與相關成果

回顧中國出版、印刷與書籍的相關研究，最早的研究成果可上溯至二十世紀初，1918 年孫毓修（1871-1922）《中國雕版源流考》的出版。²⁷至於正式以

²³ Joseph R. Dennis, *Writing, Publishing, and Reading Local Gazetteers in Imperial China, 1100-170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²⁴ 相關訊息參見 Hilde De Weerd, and Joe Dennis, "Workshop Report: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Print Culture in China,'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Harvard University (April 29-30, 2005)," *SHARP News* 14:3 (2005): 1-2.

²⁵ 論壇網址：<http://printculture.nccu.edu.tw>，擷取日期：2016.3.25。

²⁶ 討論區網址：http://blog.sina.com.tw/late_qing，擷取日期：2016.3.25。

²⁷ 孫毓修，《中國雕版源流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18）。

「中國出版史」為書名的專著，則由楊壽清《中國出版界簡史》首開先河。²⁸相較之下，西方學者卡特（Thomas Francis Carter, 1882-1925）在 1925 年發表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則是歐美人士最早針對中國印刷術與其西傳影響問題的英文研究。²⁹該書在 1938 年由劉麟生（1894-1980）譯成中文，商務印書館刊印出版，書名譯為《中國印刷術源流史》。³⁰此後，關於中國出版業、印刷業、書籍業的研究，不斷有各種專著論文與文獻史料選輯相繼出版。1960-70 年代期間，錢存訓（1910-2015）在 1962 年以英文發表 *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Books and Inscriptions*。該書後由周寧森翻譯為中文，並於 1975 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³¹同時期的中文著作也相當豐富，例如：戈公振《中國報學史》（1964）；淨雨《清代印刷史小記》（1961）；盧前《書林掌故》（1972）。³²史料選輯方面，則有：張靜廬輯註的《中國出版史料補編》（1957）；喬衍琯、張錦郎編輯有《圖書印刷發展史論文集》（1975）；劉家璧編訂，《中國圖書史資料集》（1974）；喬衍琯、張錦郎《圖書印刷發展史論文集：續編》（1979）等書。³³1980 年前後的相關研究成果，則有：魏隱儒《中國古籍印刷史》（1984）；方行〈明清出版業的資本主義萌芽淺談〉（1985）；張召奎《中國出版史概要》（1985）等人的研究成果。³⁴

²⁸ 張志強，〈中國出版史研究的雙璧：兩部最早的中國出版史研究著作評析〉，《中國出版》，12（2001），頁 42-44。

²⁹ Thomas Francis Carter,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25).

³⁰ 卡特著，劉麟生譯，《中國印刷術源流史》（長沙：商務印書館，1938）。

³¹ Tsuen-hsuei Tsien, *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Books and Inscrip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中譯：周寧森譯，《書於竹帛：中國古代書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75）。

³²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香港：泰平書局，1964）。張靜廬輯註，《中國出版史料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57）。淨雨撰，《清代印刷史小記》（臺北：世界書局，1961）。

盧前，《書林掌故》（香港：中山圖書公司，1972）。

³³ 張靜廬輯註，《中國出版史料補編》。喬衍琯、張錦郎編，《圖書印刷發展史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5）；《圖書印刷發展史論文集：續編》（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魏隱儒，《中國古籍印刷史》。劉家璧編訂，《中國圖書史資料集》（香港：龍門書店，1974）。

³⁴ 方行，〈明清出版業的資本主義萌芽淺談〉，《平淮學刊》，10（1985），頁 159-165。

近三十年來華文世界針對圖書出版史的專著甚多，例如：張秀民《張秀民印刷史論文集》（1988）；宋原放、李白堅《中國出版史》（1991）；張煜明《中國出版史》（1994）；方厚樞《中國出版史話》（1996）；張秀民、韓琦《中國活字印刷史》（1998）；鄭士德《中國圖書發行史》（2000）；繆咏禾《明代出版史稿》（2000）；肖東發《中國圖書出版印刷史論》（2001）；姚伯岳《中國圖書版本學》（2004），以及石宗源、柳斌杰擔任總顧問，並由肖東發、周少川、曹之、李致忠、繆咏禾、朱賽虹、曹鳳祥、劉蘭肖、汪家熔、王餘光、吳永貴、方厚樞、魏玉山等學者，按朝代分冊編著的《中國出版通史》（2008）等書，上述研究專著強調的是技術史與出版事業的演進。³⁵出版業相關史料文獻選集方面，則有：《中國近代現代出版史學術討論會文集》（1990）；《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出版史學術研討會文集》（1993）；宋原放主編《中國出版史料》共三冊（2001-2004）；張靜廬編輯《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2003）等。

近年來在綜合性、跨領域的相關研究上，中文學界亦有重要研究成果。例如：宋莉華《明清時期的小說傳播》（2004）一書，試圖結合傳播學理論，討論明清時期小說傳播、印刷技術，以及小說的相關流通渠道。³⁶范軍《出版文化散論》（2004）提出「印刷史也是出版文化史」的論點，主張採用社會學的方法，討論出版業與社會生活間的關係。³⁷張仲民《出版與文化政治：晚清的「衛生」書籍研究》（2009），則是試圖結合醫療史與出版文化史的創新研究。³⁸還有結合設計風格與圖書形式變遷的跨領域研究，例如：趙健《範

張召奎，《中國出版史概要》（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³⁵ 張秀民，《張秀民印刷史論文集》（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1988）；《中國印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宋原放、李白堅，《中國出版史》。張煜明，《中國出版史》。方厚樞，《中國出版史話》。張秀民、韓琦，《中國活字印刷史》（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鄭士德，《中國圖書發行史》。繆咏禾，《明代出版史稿》（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肖東發，《中國圖書出版印刷史論》。姚伯岳，《中國圖書版本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石宗源、柳斌杰總顧問，肖東發等編著，《中國出版通史》（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08）。

³⁶ 宋莉華，《明清時期的小說傳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³⁷ 范軍，《出版文化散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³⁸ 張仲民，《出版與文化政治：晚清的「衛生」書籍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

式革命：中國現代書籍設計的發端（1862-1937）》（2011）。³⁹

清代官方刻印圖書的研究方面，周振鶴、顧美華關於清代官書《聖諭廣訓》的研究，由該書的版本、印行、鄉里宣講，進行相關討論（2006）。⁴⁰此外，王記錄討論清代國史館編纂刊印史書的專著《清代史館與清代政治》（2009），以及翁連溪《清代宮廷刻書》（2001）等，都是近年重要的研究成果。⁴¹最後，相較於明清兩代官方出版，關於民間坊刊出版情況，近年來也開始逐漸為學界重視與注意。例如關於明代坊刻研究的專著方面，近年有程國賦《明代書坊與小說研究》（2008），該書書後並附錄有「明代坊刻小說目錄」與研究參考書目。⁴²綜合性的討論明清時期江南一帶私人刻書發展歷史的研究成果，則有：葉樹聲、余敏輝《明清江南私人刻書史略》（2000）。⁴³關注明代福建建陽商業出版的專著，則有路善全《在盛衰的背後：明代建陽書坊傳播生態研究》（2009）。⁴⁴近來也有關注明代坊刻圖書中科舉用書的專著，如沈俊平《舉業津梁：明中葉以後坊刻制舉用書的生產與流通》（2009）。⁴⁵另外，也有討論單一坊刻書坊的專著，如楊麗瑩《掃葉山房史研究》（2013）便以清代掃葉山房書坊的發展歷史、出版物的特點，進行詳細研究。⁴⁶還有一些結合清代文集與清代刻書文化的研究成果，例如：何明星《著述與宗族：清人文集編刻方式的社會學考察》（2007）。⁴⁷

大陸學界近來更有針對書籍史、出版史、印刷史進行的研究書目整理，

³⁹ 趙健，《範式革命：中國現代書籍設計的發端（1862-1937）》（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1）。

⁴⁰ 周振鶴編，顧美華點校，《聖諭廣訓集解與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⁴¹ 王記錄，《清代史館與清代政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翁連溪，《清代宮廷刻書》（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

⁴² 程國賦，《明代書坊與小說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

⁴³ 葉樹聲、余敏輝，《明清江南私人刻書史略》（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

⁴⁴ 路善全，《在盛衰的背後：明代建陽書坊傳播生態研究》（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9）。

⁴⁵ 沈俊平，《舉業津梁：明中葉以後坊刻制舉用書的生產與流通》（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9）。

⁴⁶ 楊麗瑩，《掃葉山房史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

⁴⁷ 何明星，《著述與宗族：清人文集編刻方式的社會學考察》（北京：中華書局，2007）。

以及研究回顧評述。例如錢存訓輯錄的《中國印刷史書目》，提供從事此項研究所需的重要研究索引，內容上反映百年來有關此議題的重要研究成果。⁴⁸ 相關研究回顧與目錄方面，范軍編輯有〈出版文化史研究論著目錄（2000-2004）〉（2005）。稍後，范軍編輯出版《中國出版文化史研究書錄（1978-2009）》（2011）。⁴⁹ 此外另有魏玉山〈出版史研究百年沿革〉、⁵⁰ 程煥文〈建國以來晚清圖書館學術史研究綜述〉、⁵¹ 肖東發與袁逸兩人合編的〈二十世紀中國出版史研究鳥瞰〉、⁵² 肖東發〈中國出版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等論文。⁵³

學位論文方面，相關議題的討論主要以臺灣學界的研究成果最為顯著。最近十多年來，大陸學界雖有相關綜合性評述與短評，但研究成果仍比較有限。⁵⁴ 最近漸漸開始有專門討論明代商業出版的優秀博士論文，修訂編輯成專書，如郭孟良《晚明商業出版》（2011）。⁵⁵ 近年來臺灣學界研究晚清以來報刊、出版業，以及相關社會文化影響的學位論文，主要有：王飛仙〈期刊、出版與社會文化變遷：五四前後的商務印書館與《學生雜誌》〉（2001）⁵⁶；李仁淵〈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分子：以報刊出版為中心的討論〉（2002）⁵⁷；鄭世芸〈傳播・權力・文化的新場域：以晚清留日學生報刊為研究中心〉

⁴⁸ 錢存訓，《中國紙和印刷文化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⁴⁹ 范軍，〈出版文化史研究論著目錄（2000-2004）〉，《出版科學》，3（2005），頁 56-61。

范軍編輯，《中國出版文化史研究書錄（1978-2009）》（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1）。

⁵⁰ 魏玉山，〈出版史研究百年沿革〉，分別載於《出版發行研究》（2002），第 3、4、7 期，頁 75-80；頁 71-74；頁 70-73。

⁵¹ 程煥文，《晚清圖書館學術思想史》（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頁 21-43。

⁵² 肖東發、袁逸合編，〈二十世紀中國出版史研究鳥瞰〉，《北京大學學報》，2（1999），頁 126-135。

⁵³ 肖東發，〈中國出版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出版科學》，3（2002），頁 57-64。

⁵⁴ 張仲民，〈從書籍史到閱讀史——關於晚清書籍史、閱讀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⁵⁵ 郭孟良，《晚明商業出版》（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1）。

⁵⁶ 王飛仙，〈期刊、出版與社會文化變遷：五四前後的商務印書館與《學生雜誌》〉（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1）。

⁵⁷ 李仁淵，〈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分子：以報刊出版為中心的討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2004)。⁵⁸ 至於印刷術的使用，與晚清以來的發展情況，也有相關學位論文，例如：李貴豐〈從傳統到現代：中國圖像版印技術之蛻變（1600-1900）〉（1992）；⁵⁹ 吳麗雯〈清末民初石版印刷術傳入中國之發展及其影響〉（1997）。⁶⁰ 另外，近來也有以明代出版文化為主題的碩士論文，經修改後以專書形式出版，例如：許媛婷《藏書拼圖：明代圖書文化析論》（2010）。⁶¹

除論文與研究專著外，近年來中文世界學者們更致力於譯介多部西方出版史、書籍史、印刷史的重要經典，介紹西方相關研究的重要成果。例如：賈士衡翻譯的彼得·柏克（Peter Burke）《知識社會史：從古騰堡到狄德羅》（2003）；李鴻志翻譯的費夫賀、馬爾坦《印刷書的誕生》（2005）；劉陽翻譯的巴比葉（Frederic Barbier）《書籍的歷史》（2005）；葉桐、顧杭翻譯的羅伯·丹頓（Robert Darnton）《啟蒙運動的生意：《百科全書》出版史（1775-1800）》（2005）。⁶² 大陸學界也有許多譯介的成果，例如：何朝暉翻譯的周紹明《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與士人文化》（2009）；張志強等人翻譯的芮哲非《谷騰堡在上海：中國的印刷資本主義，1876-1937年》（2014）；劉永華、饒佳榮翻譯的包筠雅《文化貿易：清代至民國時期四堡的書籍交易》。⁶³ 除專書譯介外，也有國內學者撰述專文詳細介紹法國閱讀史的演變與相關理論的討論，例如臺灣大學秦曼儀發表的專文〈兩位書籍史家的方法論反省與

⁵⁸ 鄭世芸，〈傳播·權力·文化的新場域——以晚清留日學生報刊為研究中心〉（臺北：淡江大學漢語文化暨文獻資源研究所碩士班碩士論文，2004）。

⁵⁹ 李貴豐，〈從傳統到現代：中國圖像版印技術之蛻變（1600-1900）〉（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1992）。

⁶⁰ 吳麗雯，〈清末民初石版印刷術傳入中國之發展及其影響〉（臺北：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⁶¹ 許媛婷，《藏書拼圖：明代圖書文化析論》（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

⁶² 彼得·柏克著，賈士衡譯，《知識社會史：從古騰堡到狄德羅》（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費夫賀、馬爾坦著，李鴻志譯，《印刷書的誕生》（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05）。巴比葉著，劉陽譯，《書籍的歷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羅伯·丹頓著，葉桐、顧杭譯，《啟蒙運動的生意：《百科全書》出版史（1775-1800）》（北京：新華書店，2005）。

⁶³ 周紹明著，何朝暉譯，《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與士人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芮哲非著，張志強等譯，《谷騰堡在上海：中國的印刷資本主義，1876-1937年》（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包筠雅著，劉永華、饒佳榮翻譯，《文化貿易：清代至民國時期四堡的書籍交易》（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實踐：馬爾坦和夏提埃對於書籍、閱讀和書寫文化史的研究》。⁶⁴此外，隨著相關議題的熱烈討論，也有不少普及讀物出版。例如：羅樹寶的《書香三千年》（2005）；《說·書：從獸骨到紙張的文字行旅》（2007）等。⁶⁵

（三）近年來日本學界關於商業出版的相關研究

日本學界早年的相關研究，主要偏向於科技史與技術史的層面。相較於歐美與中文學界，日本學者在研究取徑上採取世界史、東亞史視野，進行比較研究。相關研究成果，例如：中山久四郎《世界印刷通史》（1930）；禿氏祐祥《東洋印刷史序說》（1950）、《東洋印刷史研究》（1981）；長澤規矩也《和漢書の印刷とその歴史》、《圖解和漢印刷史》（1970）。⁶⁶長澤規矩也對於宋、元刻版的研究，提出辨識文獻的重要方法，並提供出版印刷的相關文獻出處，可以說是為後續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礎。附帶一提，近年也有針對宋代圖書收藏與散佚情形等議題進行討論的專著，例如：會谷佳光《宋代書籍聚散考：新唐書藝文志釋氏類の研究》（2004）。⁶⁷近年關於蒙元時期出版文化，則有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2006）一書進行相關討論與研究。⁶⁸另外，日本學界對於中國出版印刷史的研究成果也進行不少譯介，例如：広山秀則 1960 年翻譯出版張秀民《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日文書名題為：《中國の印刷術：その歴史的發展と影響》，便是這方面研究的譯介成果。⁶⁹宇都木章等人 1980 年翻譯出版錢存訓《書於竹帛：中國古代書

⁶⁴ 秦曼儀，〈兩位書籍史家的方法論反省與實踐：馬爾坦和夏提埃對於書籍、閱讀和書寫文化史的研究〉，《臺大歷史學報》，41（2008），頁 257-314。

⁶⁵ 羅樹寶，《書香三千年》（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05）。羅樹寶，《說·書：從獸骨到紙張的文字行旅》（臺北：商周出版公司，2007）。

⁶⁶ 美國學者包筠雅對於日本學界的相關研究，曾撰有詳細的研究回顧。參見 Cynthia J. Brokaw, "Publishing, Society and Culture in Pre-Modern China: The Evolution of Print Cul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1(2005): 135-165.

⁶⁷ 會谷佳光，《宋代書籍聚散考：新唐書藝文志釋氏類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4）。

⁶⁸ 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6）。

⁶⁹ 張秀民著，広山秀則譯，《中國の印刷術：その歴史的發展と影響》（譯自：《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京都：関書院，1960）。

史》，日文書名題為《中国古代書籍史：竹帛に書す》。⁷⁰

相較之下，日本學界近年在研究方法上開始採取結合文化與出版的綜合性討論。其問題意識也開始轉向出版文化中的社會層面，相關的研究成果，例如：大木康、酒井忠夫、金文京、磯部彰、岡本さえ、井上進的相關著作，便相當值得注意與參考。大木康教授的研究主要集中於明代馮夢龍與《三言兩拍》，以及江南出版文化，包括〈馮夢龍『三言』の編纂意図について：特に勧善懲惡の意義をめぐって〉（1985）、《明末のはぐれ知識人：馮夢龍と蘇州文化》（1995）、《馮夢龍『山歌』の研究：中國明代の通俗歌》（2003）以及《明末江南の出版文化》（2004）。⁷¹大木康在這些研究成果中，利用城市士大夫與鄉里故事、鄉里通俗歌曲之間的互動，建構其對於明代文化的一系列討論。

酒井忠夫的研究，主要在討論明代以來日用類書與善書的發展，特別是晚明開始出現由小商人、富農、工人所組成非菁英讀者群體。⁷²金文京、磯部彰則利用《三國通俗演義》與《西遊記》討論晚明公眾閱讀的本質。⁷³岡本さえ《清代禁書の研究》則詳細地討論乾隆皇帝文字獄，以及中華晚期帝國的禁書制度對於政治與思想的影響。⁷⁴此外，井上進的相關研究，也是近年來日本學界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例如其專著《中國出版文化史：書物世界と知の風景》（2002），將中國出版文化作出時代的劃分，並提出整體的討論，具有極高的參考價值。⁷⁵其後，2006年出版《書林の眺望：伝統中国の

⁷⁰ 錢存訓著，宇都木章等譯，《中国古代書籍史：竹帛に書す》（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1980）。

⁷¹ 大木康，〈馮夢龍『三言』の編纂意図について：特に勧善懲惡の意義をめぐって〉，《東方學》，69（1985），頁105-118；《明末のはぐれ知識人：馮夢龍と蘇州文化》（東京：講談社，1995）；〈黃牡丹詩會——明末清初江南文人點描〉，《東方學》，99（2000），頁3-46；《馮夢龍『山歌』の研究：中國明代の通俗歌》（東京：勁草書房，2003）；《明末江南の出版文化》（東京：研文出版，2004）。

⁷² 酒井忠夫，《中國善書の研究》（東京：光洋社，1972）。酒井忠夫，《增補中國善書の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1999-2000）。

⁷³ 磯部彰，《西遊記形成史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93）。金文京，《三國志演義の世界》（東京：東方書店，1993）。

⁷⁴ 岡本さえ，《清代禁書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1996）。

⁷⁵ 井上進，《中國出版文化史：書物世界と知の風景》（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會，

書物世界》，介紹傳統中國的圖書世界。⁷⁶除通論性著作外，井上進另外針對明清學術思想與出版問題，發表專著《明清學術變遷史：出版と伝統學術の臨界点》（2011）。⁷⁷

二、綜合討論：思想、印刷、抄寫與東亞各國間的知識流動

以下將分成三個部分進行討論，並結合相關評述與回應，以便對近年來的研究成果進行綜合性的討論。

（一）物質與生產層面之外：出版文化研究如何與思想史進行對話

近年來的研究中，各國學者們往往質問是誰在真正經營出版？以及一部書為何被出版，出版背後的理念為何？並且進一步質問明清出版文化中，販書業、出版業的經營者如何進一步在各地傳播知識的同時，更形成不同文人社群間的互動。明清商業文化出版與官方出版，究竟如何影響當時的士人議論與民間社會的街談巷議？傳統中國文人的生活與世界觀是否也與出版文化有著密切的互動等，這一些議題構成近年來相關討論的一系列焦點。⁷⁸但文化生產的本身，卻也離不開商業活動的推動。正因為這種同時兼具文化生產與商業活動的特性，使得研究者得以重新審視傳統中國的士人文化，質問士人在日常生活中真正的形象。由此，研究者更得以將研究視野由菁英文化，擴及至更加庶民化的商業出版中。

筆者以為這些明清士人與書商的合作關係，恰巧證明士人們在商業出版事業中介入的程度。也就是當研究者考量到所謂的士人，其在出版文化中所

2002)。

⁷⁶ 井上進，《書林の眺望：伝統中国の書物世界》（東京：平凡社，2006）。

⁷⁷ 井上進，《明清學術變遷史：出版と伝統學術の臨界点》（東京：平凡社，2011）。

⁷⁸ 周啟榮曾就此類議題進行過討論，參見 Kai-wing Chow,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90-148.

扮演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無論研究者用何種方式稱呼他們，這群以山人、居士、士商，又或者是以出版商的身分出現的士人，他們的確形塑與影響傳統中國的出版文化，甚至運用出版來推動特定的思想風潮。因此，相關領域進一步的研究方向或許可由刻書業、印書業的活動著手，進一步觀察思想風潮的時代變化，讓出版文化研究與思想史研究進行交流對話。筆者多年來研究清朝刻書活動與晚清宋學復興的互動中，便常能在文獻中看到這類特殊的文化復興現象。清中葉以來讀書人們時常透過在鄉里重刊舊籍的方式，以此作為思想資源的媒介。這些地方上的讀書人們一方面講學鄉里，同時刊印小冊子，試圖藉此重新動員某些昔日的思想資源。他們的訴求也相當多元，有些人主張復興一地的學術傳統，又或者想提倡某些道德價值，進而帶動一時一地的學術風尚。透過各種書籍的再印行、再修訂的過程，我們常能看到其中所呈現的微妙交互作用，例如：嘉慶、道光以來各種白蓮教起事不斷，地方上的小讀書人受到亂事衝擊的影響，促成他們將各種關於邪教起事變亂的傳聞臆說，參酌官方刊印的《欽定平定教匪紀略》，編輯成簡單易讀的小冊子，廣為刊行。道光初年，石香居士（道光年間人士，生卒年不詳）編輯《勘靖教匪述編》一書，專述天理教起事始末。石香居士在書中〈附述〉自言編印此書：「是欲提倡忠節，懲逆亂，並廣時事之傳聞」，可見這類小冊子的編印，並非無意為之，而是為了在亂世中提倡忠節。⁷⁹

稍後，太平天國起事東南，戰禍多年，當時湘軍成員左宗棠（1812-1885）等人便以為漢學考據訓詁，實為釀成太平天國作亂的真正原因。⁸⁰左氏的論點並非孤證，咸豐、同治以來持此論點者大有人在，方宗誠（1818-1888）、孫

⁷⁹ [清]石香居士編輯，《勘靖教匪述編》（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1970），卷12，〈附述〉，頁44。另外，嘉慶朝亦有盛大士參酌《欽定平定教匪紀略》，並採訪相關傳聞，編輯成的《靖逆記》，參見[清]盛大士，《靖逆記》（上海：上海書店，1987），卷首，頁1。

⁸⁰ 晚清以來類似討論不少，將各種變亂不治，皆歸因為漢學。當時有人責備中華亡於滿清，主因提倡漢學。章太炎曾舉義大利文藝復興為例，論說義大利文藝復興「且以文學復古為之前導，漢學亦然，其于種族，固有益無損」，試圖以此為漢學開脫其罪。章太炎，〈革命之道德〉，收於朱維錚、姜義華編注，《章太炎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頁295。

鼎臣（1819-1859）等亦持此說。⁸¹湘軍成員與朝廷理學重臣為求崇正學術，教化人心，當時便有重新刻印出版各類宋學書籍的復興運動。⁸²方東樹《漢學商兌》與其詩文集不斷地重刻、重刊，便是此種宋學復興運動的產物。方氏所高舉宋學，以及對於世道人心、詩文著作的各種議論，再一次於同治年間透過士人的多方倡議被再次刻印出版，並成為挽救世道人心的救命良方。⁸³同一本書的再一次印行，再一次被提倡，正好反映思潮上的重大變化轉折。

此外，晚清《民報》等刊物中「晚明遺獻」的再出現，也是相關的例證。前朝文獻的再刊印，可說是間接鼓動日後排滿革命的興起，甚至時人有「無報不談明末事」之語。這種前朝歷史文獻的再刊印，甚至成為日後革命意識的思想資源，也是清代出版文化的重要現象之一。⁸⁴凡此種種，皆能見證，出版文化本身並不只是商業活動。其中各種再刊印、再編輯、再註譯、再傳抄的過程，其實也影響當時思想風氣的變化，甚至產生跨文化、跨國境的長

⁸¹ 方宗誠認為：「今世以儒為詬病，起於何時何人。異端之熾如天主邪教之入中國，爭相傳習。國勢之弱，受制於外夷何故。竊以為漢學諸公，亦不得為無罪也。」另外，孫鼎臣則以為漢學實有害人心風俗，士大夫因向風爭趨漢學的學術潮流下，天下學術因此起了大變化，而天下之禍實始於士大夫學術之變。參見〔清〕方宗誠，《柏堂遺書》（臺北：藝文印書館，據清光緒間志學堂家刊本影印，1971），〈集外編四·與黃子壽太史〉，頁 17b。〔清〕孫鼎臣，《芻論》（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咸豐十年武昌節署本），卷 1，頁 3b-5a。

⁸² 左宗棠寫道：「自乾隆中葉以來，聲音訓詁校讎之習盛。士競時局，逐聲氣，以搏擊儒先為能。放言無忌，釀成今日犯上作亂之禍。」即便採持平和折衷之說的曾國藩，也在文詞間指出此時議論者多將太平天國粵賊之亂，歸因於漢學之弊。曾氏寫道：「曩者良知之說，誠非無蔽，必謂其釀晚明之禍，則少過矣。近者漢學之說，誠非無蔽，必謂其致粵賊之亂，則少過矣。」參見〔清〕左宗棠，《左宗棠全集》（上海：新華書店，1986），頁 251。〔清〕曾國藩，〈序〉，收入〔清〕孫鼎臣，《芻論》，首卷，頁 1a-1b。劉咸炘〈近世理學論〉中即言：「粵寇起，羅澤南、曾國藩以鄉兵起湖南，卒平大難。而北人李棠階、倭仁時實為相，四人皆宗宋儒，天下遂以中興之功，歸功理學，理學由此復盛……。」參見〔清〕劉咸炘，《學史散篇·近世理學論》，收於氏著，《推十書（增補全本）》（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綱旨·未刊稿〉，頁 1278-1279。

⁸³ 當時閩浙總督吳棠閱讀方東樹相關著作圖書，甚感其書有補於聖道教化。曾國藩則認為方氏之學，遠非管同、梅曾亮所能及，極力倡議方氏詩文的刊行等。參見〔清〕方東樹，《儀衛先生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同治七年刊本），卷首，〈目錄〉，頁 2a-3a。

⁸⁴ 王汎森，〈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現象——禁書復出及其意義〉，《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頁 603-644。

遠影響。最後，我們可以這樣認為，出版物在物質層面的數量與形式變化，進而影響精神層面與思想資源的深層變化，促使當時的人們重新發現與詮釋一些道德信念與價值觀，這種觀察或可成為日後相關研究的一種取徑。

（二）「菁英」與「庶民」的視角之外：東亞出版文化研究的可能性

近來學界相關的延伸討論中，也有聚焦於定義「出版文化」的內涵究竟為何？特別是中國的出版文化其獨特性質在那裡？這個問題在於質問中國的出版文化史研究在本質上，究竟與西方出版文化史的研究，到底有何不同。學者們質問著明清出版文化究竟是對傳統出版文化的延續，或是一種變革。傳統中國商業文化出版，其歷史進程為何？其研究的範式是否能運用前近代、近代，以及現代歷史發展過程進行討論。其中的討論自然也涉及商業與文化的交互作用，也就是出版文化的本質，到底是菁英思想的庶民化，還是庶民生活體驗的一種昇華轉化？研究者們多半想揭示士人們心中真正想透過出版傳達的價值觀，試圖討論其中的精神世界的內涵究竟是一種經世思想、遺民思想，還是儒家願景，抑或是治國方略。另一方面，各國研究者們同時也探討一般庶民的閱讀世界為何？庶民世界觀是否也與出版文化有所互動，以及能否由文獻中尋找出屬於庶民的價值觀？其中，學界討論也涉及一些非商業性質的出版，例如善書、寶卷、功過格等，這類具有功德助印性質的宗教出版物，又該如何加以分析。⁸⁵西方出版史的研究背景，能否符合傳統中國的情況，一直反覆出現在相關研究討論之中。

綜合以上關於研究模式的討論，筆者以為或許由擴大研究視角的方式著手，經由不同研究案例，進而增加比較研究上的可能性，才能漸漸形成東亞出版文化研究的具體特色。例如相關域外漢籍中的記載，或可成為重要的文獻史料。舉例而言，歷代朝鮮使臣們出使北京的相關記錄匯集而成的各種《燕行錄》，其中就載有明清時期書商、書販的資料，若細加摘錄整理，或可供

⁸⁵ 明清時期「功過格」相關研究，可參見王汎森、美國學者包筠雅等人的研究。王汎森，〈明末清初的人譜與省過會〉，《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頁 245-249。Cynthia Brokaw, "Yüan Huang (1533-1606) and the Ledgers of Merit and Demerit,"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7:1(1987): 137-195.

進一步的研究。《燕行錄》中記載有當時朝鮮使臣與清人討論學術的對話，亦涉及清朝與朝鮮在出版文化上的交流。例如：朝鮮使臣時常向清朝文人問及浙江李霽霖，他們多半認為李氏是當世大學者，聲名卓著，在朝鮮士林學子之間為人共所周知。但在使臣與不同讀書士人求證的結果，則與此大不相同。對清朝文士們而言，李氏不過只是一名富有商人，雖然他廣延各方學者刊書，但徒為謀利而刊行圖書，並非是研究學問的儒者文士。使臣們在多方求證後，方才相信此人雖然在朝鮮文壇頗有盛名，但在清朝不過是一位以印刷為業的富人而已。⁸⁶這類筆談記錄散見於明清時期的各種《燕行錄》中。筆談對象也並不限於明清兩朝有功名的士人，這些記錄實際上可以說是廣泛觸及朝鮮使節在使行途中所遇到各種能進行文字筆談的識字階層人士。⁸⁷近來已有研究者注意到相關問題，並進行討論，例如：吳政緯在〈從中朝關係史看明清史研究的新面向——以《燕行錄》為中心〉文中表示：「藉由域外漢文文獻探索古籍在明清中國的流傳，擴充史料做為明清史研究之資進行個案研究，仍是未來不可忽視的發展方面。」該文並指出醫療與醫籍或者可作為東亞間的文化交流，《燕行錄》與書籍傳播之間的一個重要的結合樞紐。⁸⁸

除此之外，明清時期識字率的問題，以及閱讀社群的規模情況，也可由琉球使者記錄匯輯而成的《琉球瑣記》，而得到一個琉球使者由杭州沿運河，而至北京一帶的不同觀察。⁸⁹筆者認為如能透過不同角度，參考各種域外漢籍，以及東亞各國的史料文獻，或者能夠由研究範式的爭議中脫身。進而研

⁸⁶ 夫馬進、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日本所藏編》，冊 1（首爾：東國大學校韓國文學研究所，2001），頁 168-170。

⁸⁷ 韓國《燕行錄》研究的相關學術回顧，可參考：裴英姬，〈《燕行錄》的研究史回顧（1933-2008）〉，《臺大歷史學報》，43（2009），頁 219-255。吳政緯，〈從中朝關係史看明清史研究的新面向——以《燕行錄》為中心〉，《臺灣師大歷史學報》，51（2014），頁 209-242。

⁸⁸ 吳政緯，〈從中朝關係史看明清史研究的新面向——以《燕行錄》為中心〉，頁 209-242。

⁸⁹ 琉球使臣的記錄中就包括對於識字孩童的描寫，使臣們記載下了在出使路途上觀察到的孩童讀書識字情形。例如：民間習慣上，男子五、六歲由其父兄請鄉先生授與句讀；女子五、六歲時，習慣上也由其父兄聘請女先生教授《女訓》。參見鄭章觀、蔡邦錦口述，赤崎楨幹記錄，《琉客談記》，收於比嘉實，〈「唐旅」紀行：琉球進貢使の路程と遺跡、文書の調査〉（東京：法政大學沖繩文化研究所，1996），頁 182。

究者或許能更貼近於一種更全面、更精細的觀察，由東亞文化的視野觀察印刷業、出版業、書籍業的發展，及其與文化生產活動之間的各種互動。個人以為唯有如此，方能更加開拓一研究領域，由商業發展、經濟生活，進一步觸及東亞出版文化的真實內涵。

（三）東亞文化圈中的出版文化特殊現象：刊刻與抄寫的同時並存

學界討論傳統中國的出版文化研究時，大多數研究集中在印刷圖書，而較忽視手抄本在傳遞知識文化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事實上許多著作的流傳，在一定的程度上仍然依靠手抄本的幫助。甚至直到晚清開始引入西方機器印刷術後，許多文人依然依賴著手抄的方式來獲得書籍。例如晚清文人譚獻（1832-1901）在《復堂日記》便有一段相當鮮活生動的記載。

今年先後買得明刻本《通典》、《通志略》、《文獻通考》三書。求之十年，乃始得具，寒士物力之艱如此。至版刻不精，紙墨漫漶闕葉，手抄補完。吾輩讀書，比之溫岐言「有孔即吹」，亦曰「有字即讀」而已。⁹⁰

透過清人的眼光，我們得以對明清時期的出版文化，有一個比較貼近實情的理解。近年來許多研究中常有將現代出版印刷概念移置於傳統中國研究的錯植情況，便是出於此類的誤讀與誤解。傳統中國文獻流傳方式，以及印刷出版的程序與現代頗不相同，以下分成四點進行討論分析。

第一，各種圖書在尚未雕版開印之前，甚至刷印之後，並不意謂著手抄本就此消失。基本上，各種圖書的手抄本的流傳非常普遍，甚至對於喜好藏書者而言（例如上述的譚獻），抄本甚至具有更高的鑑賞價值。⁹¹因此，手抄本與印本並行於市面，甚至在刻印本發行之後仍然有其重要性，為文人所重視，舊抄本往往相當名貴。另外，許多地方的小讀書人，經濟能力有限，無

⁹⁰ 譚獻，《復堂日記》（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頁26-27。

⁹¹ 譚獻在《復堂日記》中對此也有相當的討論，他寫道：「明人寫本《北堂書抄》一百六十卷，字畫訛舛，然是永興真本。世行陳禹謨刻，改易面目，盡失本真。引據古書，輒以世俗本承改，其書可燒也……。」參見譚獻，《復堂日記》，頁26。

法買書，即使很平常的書，也多半依賴抄寫的方式取得書籍。⁹²因為過去印書，一刷常只有兩、三百部，印量非常有限。透過上述的例子，便能發覺當時購買書籍並不似現代方便，所以僱工抄寫反而比較容易。

第二個重點，所謂的「付梓印刷」，並不一定一次刷印整部書，或是整部集子。當時的出版往往是以個人著作的某一部分，也常是以單篇的形式印行。前人研究成果，例如傅斯年曾在〈戰國文籍中之篇式書體：一個短記〉對此提供許多討論與闡明。⁹³王汎森則在〈對《文史通義·言公》的一個新認識〉文中，對於這種現象進行延伸討論，他指出明代後期大量存在各種不分真偽，任意移置抄輯他人書籍的現象。⁹⁴我們可以說這一種單篇印行的情況不僅發生在中國古代，事實上在明清時期也依然如此。第三，明清時期東亞各國間的知識流動方面，有一些具體案例呈現出了由抄寫資料，經過再編輯後形成印刷出版圖書。這種曲折的傳播過程反映出當時人們為躲避政治審查與查禁的各種約束，而將印刷圖書再度透過抄寫的方式進行複製，進一步在私下廣泛流傳普及的特殊出版文化現象，例如：岸本美緒在研究《海外新話》版本內容時，發現到此書內容大都來自於一本作者與出版情況不明的《夷匪犯境錄》。透過許多旁證與書中內容的交互比勘，岸本推測《夷匪犯境錄》實係蘇州一帶幕友的工作日誌，後來輾轉地被當地的幕友與從事跨國貿易的中國商人搜集整理，被帶至長崎。最後，《夷匪犯境錄》被日本藩士嶺田楓江（1817-1883）編成《海外新話》，刊印出版。此書雖一時被幕府列為禁書，但卻被幕末志士、農民與商人階層私下傳抄。透過各種翻抄與再編輯活動的引介，《海外新話》最終成為幕末時期的重要思想資源。《夷匪犯境錄》的流傳，更是曲折離奇，此書在晚清時又再次傳回中國。⁹⁵

⁹² 毛春翔，《古書版本常談》（臺北：成文出版社，1978），頁 81-82。

⁹³ 傅斯年，〈戰國文籍中之篇式書體：一個短記〉，《傅斯年全集》，冊 3（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0），頁 3-8。

⁹⁴ 王汎森，〈對《文史通義·言公》的一個新認識〉，《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頁 501-530。

⁹⁵ 岸本美緒 2014 年在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的演講，便曾詳加分析《海外新話》的資料來源。該次演講資訊如下：岸本美緒，〈鴉片戰爭的信息傳播——從江南到日本〉學術演講，2014 年 9 月 29 日，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會議室。關於《海外新話》的相關研究，可參考森睦彥，〈海外新話の刊行事情〉，收於長澤先生古稀記念圖書學論集

第四，各種史評、史論類文獻在東亞世界的跨國流傳情況，也值得研究者特別注意。例如衣若蘭對清代廣東女史李晚芳（1692-1767）《讀史管見》的研究，正是聚焦於十九世紀該書在中、日兩國間輾轉流傳的過程，以及其中反映的文化交流史意義。衣若蘭並在文中討論屬於「東亞」書籍出版文化史的可能性，或可為研究東亞文化交流史的重要思考方向。⁹⁶另一方面，明清時期中、韓兩國間的史評、史論，以及歷史知識的跨國流傳，近年也有相關的研究成果集結成書發表，例如吳政緯《眷眷明朝：朝鮮士人的中國論述與文化心態 1600-1800》一書中，便對相關議題進行了分析討論。⁹⁷

結論：兼論明清時期一些反印刷文化的特殊現象

一時學術風氣的趨向，有其主流聲音，自然也就有隱伏的潛流。明清時期大量進行商業出版的文化主流之外，事實上還有一種反對印書，反對著述，「不觀圖書，束之高閣」的特殊現象。當時受到陽明心學與其後學的影響，士人在文字間或多或少會表現出一種重視內心感受，直接在行為中實踐思想的特別思想訴求。他們講求不由外在的「讀書訓詁」與「格物致知」來理解世界真理，反而試圖直接轉向內心尋求自證清明的良知良能，我們或許可以說這其中藏伏一種反印刷文化的思想潛流。王汎森在〈近世中國焚書或反印刷言論的若干斷想〉中首次提出宋明以來這一種對於印刷圖書的特別情緒，並且舉出各種例證，勾繪出當時這一類反對印刷文化的思想潛流。王氏指出這類反印刷文化的強烈情緒，可分成以下幾種不同的態度：第一種態度認為印刷圖書一多，人們往往讀書不細，不求甚解；第二種態度主要源自於理學家們的知識觀，他們反對印刷過度興盛，認為讀書的過程不是累積知識，而是為了直契道源，明心見性；第三種態度則是主張「道一風

刊行會編，《圖書學論集：長澤先生古稀記念》（東京：三省堂，1973），頁18-23。

⁹⁶ 衣若蘭，〈才女史評越扶桑——和刻本李晚芳《讀史管見》的出版與流傳〉，《臺大歷史學報》，55（2015），頁173-217。

⁹⁷ 吳政緯，《眷眷明朝：朝鮮士人的中國論述與文化心態 1600-1800》（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

同」，維護經典正統。因為，許多書中存在著「反經悖理」的言論，為求保存經典正說，必須盡可能燒棄邪說異論。古人與今人不同，他們認為最重要的東西仍應是聖人詩書上的道理。刊本一多，人言人殊，各立宗旨，徒增混亂，無法實現「道德一，風俗同」的儒家理想世界。⁹⁸

另一方面，清朝政治文化中的文字獄氛圍，其實也具體反映在印刷出版文化的內容之中。清代民間社會在經歷多起文字獄事件後，不僅有「自我壓抑」、「自我審查」、「隱語系統」等特殊思想文化現象，甚至還有自發性的「焚書燬板」行為。王汎森在〈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文獻中「自我壓抑」的現象〉中對此類清代出版文化特殊現象有相當精采的詮釋，他指出乾隆皇帝認為考據稽古之學蘊含道德上的嚴肅性和知識上的苦行精神，鼓勵人們忠實於先賢的教訓，而宋儒講學之風不免滋生個人意見，影響政治安定，由此禁抑人們的思想，而知識人也在文字獄的壓力下自我壓抑，在皇權所及之前，小心翼翼地先進行一番自我審查。於是或設置隱語系統，或是挖改原文、撕去封皮、刊以墨釘等行為隨時隨處可見。不僅作者、編者和刊刻者，甚至是讀者們也常在閱覽之際，出於恐懼，而有塗抹掩改、刀割挖剪紙頁上敏感忌諱字句的特殊閱讀行為。民間自發的焚書燬板運動，也是屢見不鮮。⁹⁹

透過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明清時期的出版文化、商業出版，以及相關各種思想、文化、跨國知識流動議題，具有相當豐富多元的面向，有待研究者更進一步探索。特別是除了歐美相關研究所提出的議題、方法與問題意識之外，如何考掘出明清時期出版文化中的特殊現象，一些特殊的閱讀行為，並且加以詳細闡明與詮釋，將會是接下來相關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的寶貴建議。文章修改過程中得到王汎森老師、陳慈玉老師、陳正國老師，以及衣若蘭老師提供的許多建議與指導，特此一併致上謝忱。

⁹⁸ 王汎森，〈近世中國焚書或反印刷言論的若干斷想〉，《古今論衡》，25（2013），頁123-132。

⁹⁹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文獻中「自我壓抑」的現象〉，《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頁393-500。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清〕方宗誠，《柏堂遺書》，臺北：藝文印書館，據清光緒間志學堂家刊本影印，1971。
- 〔清〕方東樹，《儀衛先生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同治七年（1868）刊本。
- 〔清〕左宗棠，《左宗棠全集》，上海：新華書店，1986。
- 〔清〕石香居士編輯，《勘靖教匪述編》，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據京都琉璃廠刊本景印，1970。
- 〔清〕孫鼎臣，《芻論》，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咸豐十年（1860）武昌節署本。
- 〔清〕盛大士，《靖逆記》，上海：上海書店，據嘉慶二十五年（1820）刻本景印，1987。
- 〔清〕劉咸炘，《推十書（增補全本）·甲輯》，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
- 〔清〕劉咸炘著，黃曙輝校，《劉咸炘學術論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 夫馬進、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日本所藏編》，首爾：東國大學韓國文學研究所，2001。
- 譚獻，《復堂日記》，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二、近人論著

- 大木康，《明末のはぐれ知識人：馮夢龍と蘇州文化》，東京：講談社，1995。
- 大木康，《明末江南の出版文化》，東京：研文出版，2004。
- 大木康，〈馮夢龍『三言』の編纂意図について——特に勧善懲惡の意義をめぐって〉，《東方學》，69（1985），頁 105-118。
- 大木康，《馮夢龍『山歌』の研究：中國明代の通俗歌》，東京：勁草書房，2003。
- 大木康，〈黃牡丹詩會——明末清初江南文人點描〉，《東方學》，99（2000），頁 3-46。
- 中國近代現代出版史編纂組編，《中國近代現代出版史學術討論會文集》，北京：中

- 國書籍出版社，1990。
- 中國近現代出版史編纂組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出版史學術討論會文集》，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3。
- 井上泰山、大木康、金文京、古屋昭弘等著，《花關索傳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89。
- 井上進，《中國出版文化史：書物世界と知の風景》，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2。
- 井上進，《明清學術變遷史：出版と伝統學術の臨界点》，東京：平凡社，2011。
- 井上進，《書林の眺望：伝統中国の書物世界》，東京：平凡社，2006。
- 巴比葉（Frederic Barbier），劉陽譯，《書籍的歷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香港，泰平書局，1964。
- 方行，〈明清出版業的資本主義萌芽淺談〉，《平淮學刊》，10（1985），頁 159-165。
- 方厚樞，《中國出版史話》，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
- 方漢奇，《中國新聞事業通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
- 比嘉実，《「唐旅」紀行：琉球進貢使の路程と遺跡、文書の調査》，東京：法政大學沖繩文化研究所，1996。
- 毛春翔，《古書版本常談》，臺北：成文出版社，1978。
- 王一樵，〈評述 Cynthia J. Brokaw, *Commerce in Culture: The Sibao Book Trade 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臺大歷史學報》，44（2009），頁 265-275。
- 王汎森，〈近世中國焚書或反印刷言論的若干斷想〉，《古今論衡》，25（2013），頁 123-132。
-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
- 王建輝，《文化的商務：王雲五專題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 王建輝，《出版與近代文明》，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6。
- 王飛仙，〈期刊、出版與社會文化變遷：五四前後的商務印書館與《學生雜誌》〉，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1。
-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王記錄，《清代史館與清代政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包筠雅（Cynthia Joanne Brokaw）著，劉永華、饒佳榮翻譯，《文化貿易：清代至民國時期四堡的書籍交易》，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 卡特（Thomas Francis Carter）著，劉麟生譯，《中國印刷術源流史》，長沙：商務印

書館，1938。

史梅岑，《中國印刷發展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田建平，《元代出版史》，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石宗源、柳斌杰總顧問，肖東發等編著，《中國出版通史》，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08。

吉少甫，《中國出版簡史》，上海：學林出版社，1991。

朱維錚、姜義華編著，《章太炎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衣若蘭，〈才女史評越扶桑——和刻本李晚芳《讀史管見》的出版與流傳〉，《臺大歷史學報》，55（2015），頁 173-217。

何明星，《著述與宗族：清人文集編刻方式的社會學考察》，北京：中華書局，2007。

吳政緯，〈從中朝關係史看明清史研究的新面向——以《燕行錄》為中心〉，《臺灣師大歷史學報》，51（2014），頁 209-242。

吳政緯，《眷眷明朝：朝鮮士人的中國論述與文化心態 1600-1800》，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

吳麗雯，〈清末民初石版印刷術傳入中國之發展及其影響〉，臺北：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宋原放、李白堅，《中國出版史》，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1。

宋原放主編，吳道弘、張立升、王建輝副主編，《中國出版史料》，冊 1-3，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2004。

宋莉華，《明清時期的小說傳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李仁淵，〈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分子：以報刊出版為中心的討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李白堅，《中國出版文化概觀》，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

李貴豐，〈從傳統到現代：中國圖像版印技術之蛻變（1600-1900）〉，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1992。

李瑞良，《中國出版編年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汪家熔，《商務印書館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

沈俊平，《舉業津梁：明中葉以後坊刻制舉用書的生產與流通》，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9。

肖東發，〈中國出版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出版科學》，3（2002），頁 57-64。

肖東發，《中國圖書出版印刷史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 肖東發，《中國編輯出版史》，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
- 岡本さえ，《清代禁書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96。
- 周振鶴編，《晚清營業書目》，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
- 周振鶴編，顧美華點校，《聖諭廣訓集解與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 周紹明（Joseph P. McDermott）著；何朝暉譯，《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與士人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 周寶榮，《宋代出版史研究》，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 岸本美緒，〈鴉片戰爭的信息傳播——從江南到日本〉學術演講，2014年9月29日，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會議室。
- 彼得·柏克（Peter Burke），賈士蘅譯，《知識社會史：從古騰堡到狄德羅》，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
- 芮哲非（Christopher A. Reed）著，張志強等譯，《谷騰堡在上海：中國的印刷資本主義，1876-1937年》，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 金文京，《三國志演義の世界》，東京：東方書店，1993。
- 長澤先生古稀記念圖書學論集刊行會編，《圖書學論集：長澤先生古稀記念》，東京：三省堂，1973。
- 姚伯岳，《中國圖書版本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 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6。
- 段曉琳，〈書評：Yuming He, *Home and the World: Editing the “Glorious Ming” in Woodblock-Printed Books of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n Center, 2013)〉，《明代研究》，25（2015），頁139-150。
- 范軍，〈出版文化史研究論著目錄（2000-2004）〉，《出版科學》，3（2005），頁56-61。
- 范軍，《出版文化散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 范軍編輯，《中國出版文化史研究書錄（1978-2009）》，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1。
- 范慕韓主編，《中國印刷近代史（初稿）》，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1995。
- 孫殿起，《販書偶記（附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孫毓修，《中國雕版源流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18。
- 徐小蠻，《清籍瑣議》，北京：海洋出版社，1993。
- 涂豐恩，〈明清書籍文化史的研究回顧〉，《新史學》，20：1（2009），頁181-215。
- 酒井忠夫，《中國善書の研究》，東京：光洋社，1972。
- 酒井忠夫，《增補中國善書の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1999-2000。

- 秦曼儀，〈兩位書籍史家的方法論反省與實踐：馬爾坦和夏提埃對於書籍、閱讀和書寫文化史的研究〉，《臺大歷史學報》，41（2008），頁 257-314。
- 秦曼儀，〈推薦序：《印刷書的誕生》，複數閱讀實踐史的開始〉，附於費夫賀（Lucien Febvre）、馬爾坦（Henri-Jean Martin）著，李鴻志譯，《印刷書的誕生》，臺北：貓頭鷹出版，2005，頁 5-9。
- 翁連溪，《清代宮廷刻書》，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
- 高津孝，〈米国の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中国——社會と文化》，20（2005），頁 471-481。
- 張召奎，《中國出版史概要》，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 張仲民，《出版與文化政治：晚清的「衛生」書籍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
- 張仲民，〈從書籍史到閱讀史——關於晚清書籍史、閱讀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史林》，5（2007），頁 151-180。
- 張志強，〈中國出版史研究的雙璧：兩部最早的中國出版史研究著作評析〉，《中國出版》，12（2001），頁 42-44。
- 張秀民，《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 張秀民著，広山秀則譯，《中國的印刷術：その歴史的発展と影響》，京都：關書院，1960。
- 張秀民、龍順宜，《活字印刷史話》，北京：中華書局，1979。
- 張煜明，《中國出版史》，武漢：武漢出版社，1994。
- 張靜廬輯註，《中國出版史料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57。
- 張靜廬輯註，《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上海：上海書店，2003。
- 梁其姿，〈清代的惜字會〉，《新史學》，5：2（1994），頁 83-115。
- 淨雨撰，《清代印刷史小記》，臺北：世界書局，1961。
- 章宏偉，《出版文化史論》，北京：華文出版社，2002。
- 許媛婷，《藏書拼圖：明代圖書文化析論》，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
- 陳力，《中國圖書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6。
- 郭孟良，《晚明商業出版》，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1。
- 喬衍琯、張錦郎編，《圖書印刷發展史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5。
- 喬衍琯、張錦郎編，《圖書印刷發展史論文集：續編》，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
- 傅斯年，《傅斯年全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0。
- 森睦彥，〈海外新話の刊行事情〉，收於長澤先生古稀記念圖書學論集刊行會編，《圖

- 書學論集：長澤先生古稀記念》（東京：三省堂，1973），頁 18-23。
- 程國賦，《明代書坊與小說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
- 程煥文，《晚清圖書館學術思想史》，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頁 21-43。
- 葉再生，《中國近代現代出版通史》，北京：華文出版社，2002。
- 葉再生主編，《出版史研究》，冊 1-6，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3。
- 葉樹聲、余敏輝，《明清江南私人刻書史略》，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
- 費夫賀、馬爾坦著，李鴻志譯，《印刷書的誕生》，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05。
- 會谷佳光，《宋代書籍聚散考：新唐書藝文志釋氏類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4。
- 楊麗瑩，《掃葉山房史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
- 路善全，《在盛衰的背後：明代建陽書坊傳播生態研究》，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9。
- 裴英姬，〈《燕行錄》的研究史回顧（1933-2008）〉，《臺大歷史學報》，43（2009），頁 219-255。
- 趙健，《範式革命：中國現代書籍設計的發端（1862-1937）》，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1。
- 劉永華，〈包筠雅《文化貿易：清代至民國時期四堡的書籍交易》評介〉，《歷史研究》，4（2008），頁 181-187。
- 劉永華，〈墟市、宗族與地方政治——以明代至民國時期閩西四堡為中心〉，《中國社會科學》，6（2004），頁 185-198。
- 劉俐娜，《出版史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 劉家璧編訂，《中國圖書史資料集》，香港：龍門書店，1974。
- 鄭士德，《中國圖書發行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 鄭世芸，〈傳播・權力・文化的新場域——以晚清留日學生報刊為研究中心〉，臺北：淡江大學漢語文化暨文獻資源研究所碩士班碩士論文，2004。
- 錢存訓，《中國紙和印刷文化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 錢存訓，《中國書籍紙墨印刷史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92。
- 錢存訓著，宇都木章等譯，《中国古代書籍史：竹帛に書す》，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80。
- 錢存訓著，周寧森譯，《書於竹帛：中國古代書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75。
- 磯部彰，《西遊記形成史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93。
- 繆咏禾，《明代出版史稿》，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
- 韓琦、米蓋拉（Michela Bussotti）編著，《中國和歐洲：印刷術與書籍史》，北京：

商務印書館，2008。

魏玉山，〈出版史研究百年沿革〉，《出版發行研究》，第3、4、7期（2002），頁75-80；頁71-74；頁70-73。

魏隱儒，《中國古籍印刷史》，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1984。

羅伯·丹頓(Robert Darnton)，《啟蒙運動的生意：《百科全書》出版史(1775-1800)》，新華書店，2005。

羅樹寶，《書香三千年》，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05。

羅樹寶，《說·書：從獸骨到紙張的文字行旅》，臺北：商周出版公司，2007。

羅樹寶，《中國古代印刷史》，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1993。

嚴文鬱，《中國書籍簡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

顧志興，《浙江出版史研究：中唐五代兩宋時期》，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謝柏暉，〈評 Kai-Wing Chow,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4（2006），頁237-245。

Brokaw, Cynthia J. *Commerce in Culture: The Sibao Book Trade 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Brokaw, Cynthia J. "O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China," in Cynthia J. Brokaw and Chow Kai-wing eds.,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3-54.

Brokaw, Cynthia J. "Publishing, Society and Culture in Pre-Modern China: The Evolution of Print Cul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1(2005): 135-165.

Brokaw, Cynthia J. " 'Spreading Civilization': The Distribution of Commercial Imprint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 Miaw-fen Lu ed., *Paper from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Confucianism and Book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Familial, Religious, and Material Networks* (中央研究院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近世中國的儒學與書籍). Taipei: Academia Sinica, 2013, 165-198.

Brokaw, Cynthia J. *The Ledgers of Merit and Demerit: Social Change and Moral Or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Brokaw, Cynthia J. "Yüan Huang (1533-1606) and the Ledgers of Merit and Demerit."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7:1 (1987): 137-195.

Brokaw, Cynthia J., and Chow Kai-wing eds.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Carter, Thomas Francis.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25.

- Chia, Lucille. "Book Reviews: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by Kai-wing Chow,"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5:2 (December 2005): 483-492.
- Chia, Lucille. *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 (11th-17th Centuri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Chow Kai-wing.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Darnton, Robert. "History of Reading," in Peter Burke ed.,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2, 141-142.
- Dennis, Joseph R. *Writing, Publishing, and Reading Local Gazetteers in Imperial China, 1100-170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 McDermott, Joseph P. "Rare Book Collections in Qing Dynasty Suzhou: Owners, Dealers, and Uses," in Miaw-fen Lu ed., *Paper from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Confucianism and Book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Familial, Religious, and Material Networks* (中央研究院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近世中國的儒學與書籍), 199-249. Taipei: Academia Sinica, 2013.
- McDermott, Joseph P.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 Reed, Christopher A. *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 1876-1937*. Vancouver, B.C.: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4.
- Tsien Tsuen-hsuei. *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Books and Inscrip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中譯：周寧森譯，《書於竹帛：中國古代書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75。
- Weerdt, Hilde De., and Joe Dennis, "Workshop Report: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Print Culture in China,'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Harvard University (April 29-30, 2005)." *SHARP News* 14:3 (2005): 1-2.
- He Yuming, *Home and the World: Editing the "Glorious Ming" in Woodblock-Printed Books of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Cambridge, Mass.: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3.

A Review of the Last Twenty Years of Research on the Ming-Qing Book Industry, Printing Industry and Publishing Culture

Wang, I-chiao *

In recent years, researches on the history of publishing in the Ming-Qing period which include the history of printing, the history of books, the history of bibliographic classification, the study of bibliography and the study of book editions have flourished. But in reviewing the related research, I feel that current scholarships are inadequate in the following areas: 1) In the analysis of book culture and publishing culture, questions regarding how the economic behavior of commercial presses and the activities of commercial sellers affected social production at the various levels. 2) While there are some studies on the contemporary publishing industry and printing industry, little has been done in the aspects of consumption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In addition, approaches in the study of publishing culture and the study of commercial publishing activity in the West have started to influence the field of Chinese history. Resulting in a series of new findings.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last twenty years of scholarship on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s publishing industry and the printing industry, and in the second part it discusses new findings on commercial publishing. The essay concludes with a discussion of related fields in recent years, raising some prospective area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the possibilities for related pathways of research.

Keywords: printing cultural, commercial printing, book culture, history of book, the culture of opposition to printing

* Ph.D.,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